

您的位置：比较政治研究网>教师成果

## 泰国政党模式的变迁与民主巩固

作者：高奇琦

来源：

《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02期

内容提要：西方学者在界定民主巩固内涵时主要存在三种路径：政治制度路径、民主文化路径和多元综合路径。政治制度路径的理论家强调政党的作用，民主文化路径的理论家强调公民社会的作用，而多元综合路径则试图在两者之间折衷。1997年泰国宪法以及之后的泰爱泰党兴起为泰国第二波民主化之后的民主巩固创造了条件。然而，泰爱泰党并没有专心于群众型政党的建设，而跨越式地去学习全方位政党、卡特尔政党和商业公司型政党的经验和特征。这一学习模式在促使泰爱泰党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埋下之后在喧嚣中退场的隐患。泰爱泰党的政党学习实践反映出后发国家的一种学习困境，也揭示了政党模式的次序变迁与民主巩固之间的密切关联。

关键词：政党模式；民主巩固；政党变迁；公民社会；泰国

来源：《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02期

### 一、政党在民主巩固中的地位

民主化作为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方兴未艾，而民主巩固作为这一领域的一个新热点问题正在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关民主巩固的分析最早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1970年关于拉丁美洲的转型路径研究，其关注点主要是拉丁美洲民主体制的高频率变动。<sup>[1]</sup>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兴起之后，一些民主理论家纷纷表示了对这些新兴民主国家民主稳定性的关注，譬如美国政治学家西蒙·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新民主体制必须制度化、巩固化和合法化”。<sup>[2]</sup>那如何界定民主巩固的内涵？本文认为，西方已有研究成果在界定民主巩固内涵时主要存在三种路径：政治制度路径、民主文化路径和多元综合路径。

政治制度路径主要认为，民主制度的巩固是民主巩固的关键，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波兰裔美国学者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亨廷顿的主要贡献是“两轮选举测试模式”（two-turnover test）。亨廷顿认为，衡量民主巩固的简单可行办法是，观察该政权是否两次和平地将权力移交给选举的获胜者。<sup>[3]</sup>普热沃斯基同样认为，当所有重要的政治团体将体制内的主要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唯一的机制并遵守其游戏规则时，该民主体制就被认为得到了巩固。普热沃斯基进一步细化了体制内主要政治制度的内容，包括竞争性活动的制度框架、竞争性的代议政府、经济冲突在民主渠道的解决、文官对军队的控制等。<sup>[4]</sup>

民主文化路径主要认为，民主的规范和文化要比民主制度更重要，其代表人物是阿根廷学者圭勒摩·奥唐奈尔（Guillermo O’ Donnell）和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奥唐奈尔认为，政治行为不仅受制于正式规则，而且还受到非正式规则（如裙带关系、家庭主义和私人庇护等）的影响。唐奈尔认为，需要正视非正式规则在民主巩固中的作用，即民主巩固的关键是要建立一套有效运作的民主规范。<sup>[5]</sup>达尔用另一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内容。达尔认为，民主的巩固要求有强大的民主文化，这种文化为遵守民主程序提供充分的情感和认知支持。<sup>[6]</sup>

多元综合路径主要认为，制度和文化都是影响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多元综合路径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胡安·林茨（Juan J. Linz）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林茨和斯泰潘对巩固的民主政体给出了三个向度的指标：第一，就行为层面而言，在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之内，没有重要的民族、社会、经济、政治行动者将重要的资源用于建立非民主政体；第二，就态度层面而言，绝大多数民众都具有这么一种信念，即民众程序和制度是治理社会集体生活最合适的方式；第三，就制度层面而言，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力量和非统治力量都服从并认同于特定的法律、程序和制度。<sup>[7]</sup>林茨和斯泰潘的第三点明确强调制度，而第二点则实质强调民主文化或者民主规范，第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是制度和文化层面作用的外在表现。

政党在民主巩固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政治制度路径的民主理论家更为强调政党的作用。亨廷顿的“两轮选举测试模式”实质是强调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亨廷顿对现代化国家政党制度的强调，早在其1968年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就清晰地表述过。<sup>[8]</sup>同样，普热沃斯基所言的主要政治制度，如竞争性活动的制度框架和竞争性的代议政府，实际也是在强调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多元综合路径的民主理论家也强调政党作用的发挥。林茨和斯泰潘认为，巩固的民主政体需要五个相互作用的场域：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相对自主和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确保公民自由权利和结社生活的法治、供民主政府使用的国家官僚系统、制度化的经济社会。林茨和斯泰潘认为，“充分的民主转型，特别是民主的巩固，必然涉及政治社会”，而政治社会主要由政党、选举制度、政治领导、政党之间的联盟以及立法机关组成。<sup>[9]</sup>很明显，在林茨和斯泰潘的语境中，政党是政治社会的中心。与这两个路径相比，民主文化路径的理论家更多强调公民社会在民主巩固中的作用。

## 二、泰国民主化与民主巩固的历程

泰国的第一波民主化肇始于1932年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曼谷王朝七世王的妥协下，泰国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从此启动了民主化进程。泰国的第一波民主化进程在1958年中止，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的政变开启了泰国的第一波民主化回潮。沙立和继任的他依·吉滴卡宗（Thanom Kittikatchorn）实行了长达十五年的军人独裁统治。1973年，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重新开启了泰国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1973年到1992年间，军人与职业政客交替掌权。1991年的军事政变引发了1992年的“五月风暴事件”，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坚的大规模民主运动将泰国的民主化推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新阶段。<sup>[10]</sup>可以说，1992年之后，泰国进入民主巩固阶段。泰国的两波民主化在世界民主化浪潮中处于何种位置呢？参照亨廷顿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分析，泰国的第一波民主化（1932年—1958年）基本可以被归入世界的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年—1962年），泰国的第一波回潮（1958年—1973年）可以被归入世界的第二次回潮（1958

年—1975年），泰国的第二波民主化（1973年—1992年）可以被归入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1974年至今）。

[11]

如何评价1992年之后泰国民主巩固实现的程度？按照亨廷顿的“两轮选举测试模式”，泰国很难说已经实现了民主巩固。1992年到2006年间，泰国经历了川·立派（Chuan Leekpai, 1992—1995）、班汉（Banharn Silpa-archa, 1995—1996）、差瓦立（Chavalit, 1996—1997）、川·立派（1997—2001）、他信（Thaksin Shinawatra, 2001—2005）、他信（2005—2006）六届政府。但川·立派、班汉、差瓦立这三届政府均是因为丑闻而倒台，并非因为正常的选举而实现政权轮替。川·立派第二届政府在2001年通过选举将政权移交给他信政府，这可以算做第一轮选举后的移交，但2005年他信再次获胜而并没有移交政权，随后2006年的军事政变干扰并打乱了这一民主巩固过程。尽管如此，按照亨廷顿的标准，泰国已经非常接近民主巩固。这也是在2006年之前西方国家一度认为泰国是东南亚实行民主最彻底的国家的原因。<sup>[12]</sup>但是，2006年的军事政变使得人们更为冷静地待泰国的民主进程。然而，也不能武断地说，2006年的军事政变中断了泰国的民主进程。军事政变之后，军人集团很快退出了政治舞台。这其中潜含了泰国民主巩固的成绩，即尽管军人集团在2007年也推动新宪法并试图保护其利益，但军人集团此时也清醒地认识到逆转民主进程所暗含的政治风险。2007年之后，泰国又重新进入新一轮民主巩固时期。

### 三、泰国政党的制度环境与模式变迁

泰国政党的制度环境一直表现为变动性和非连续性的特征。泰国的政党发展源于1932年政变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民党（People's party）。民党是1932年政变的主要参与者，但在建立君主立宪制之后，该党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政党制度，而将自身转变为人民协会，并宣布政党非法。民党这种害怕政党竞争的思想导致了泰国政党发展的停滞。<sup>[13]</sup>在泰国的第一部宪法——1932年宪法及其同年修正案中，并无任何关于政党的条款。直到1946年宪法才第一次述及政党条款，允许政党的存在和活动。到1955年9月，泰国颁布其历史上的第一部政党法。然而，到1958年沙立上台之后，新一轮的党禁开始。到1968年，虽然他依政府推动的1968年宪法和1968年政党法中有关于政党的较宽松规定，但此时在军人政权之下政党的活动空间几乎没有。直到1973年学生运动之后，1974年宪法和1974年政党法才重新给予政党更大的活动空间。到1974年4月选举之前，泰国政党数达到39个。到1976年泰国政变之后，政党再次被宣布为非法。直到1981年新政党法颁布，政党的活动才又再次恢复。<sup>[14]</sup>

1997年宪法颁布所推动的政党制度变迁有利于政党的整合和制度化发展。1997年宪法规定的一些改革方案倾向于扶持较大的政党。譬如，鉴于一个政党获得公共资金的数量取决于该党在前一次选举中获得席位的多少，大党可以获得更多的公共资金资助。再如政党代表制和单选区制度的引入、禁止转党的条款等都是为了加强大党的影响，并通过使政党对选民更加负责任来完善政党形象。<sup>[15]</sup>1997年后的政党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泰爱泰党的发展。但是，这一制度变迁在2006年政变之后被中止。2007年新宪法修订了政党制度和选举程序。譬如，政党名单制的功能有所弱化，并且取消了对5%以下得票率的限制，以牵制大型政党的发展。同时，新宪法规定，“凡宪法法院裁定强制解散的政党，其执行委员5年之内不得从政”。<sup>[16]</sup>

那泰国的政党模式表现出何种特征以及变迁趋势呢？本文在这里引入西方政党类型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泰国的政党模式及其变迁进行评析。西方政党类型学的发展与以下学者的贡献紧密关联：法

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在1954年提出的干部型政党(cadre parties)和群众型政党(mass parties);<sup>[17]</sup>德裔美国学者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在1954年提出的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ies);<sup>[18]</sup>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荷兰雷登大学教授彼得·梅尔(Peter Mair)在1995年提出的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sup>[19]</sup>英国学者乔纳森·霍普金(Jonathan Hopkin)和意大利学者凯特瑞那·保罗西(Caterina Paolucci)在1999年提出的商业公司型政党。<sup>[20]</sup>最后,荷兰学者安德·库维尔(André Krouwel)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连贯起来,形成一个历史主义的五阶段政党模式分类,即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卡特尔政党和商业公司型政党。<sup>[21]</sup>

根据库维尔的界定,精英型政党的存续时间主要是1860年到1920年,其社会背景是有限普选权的开放,政党组织的规模较小,政党成员精英化程度高,政党资源主要来自政党成员的私人联络,政党运作以政治精英的局部社会动员为主,政党竞争的目的是分配特权。群众型政党的存续时间主要是1880年到1950年,其在大众普选的推动下生成,政党组织规模较大,政党成员的社会普及程度较高,某一意识形态是构筑该类型政党认同的基础,政党资源主要来自党费或捐赠,政党运作以人力密集型的整体社会动员为特征,政党竞争的目的是希望在执政之后推动激进的社会改革。全方位政党的存续时间主要是1950年到现在,其社会背景是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政党组织的规模趋于缩小,政党向所有阶层开放,党内的异质化程度提高,政党资源主要来自社会捐赠,政党运作体现为人力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结合,政党参与政治竞争的目的是推动社会的渐进改良。卡特尔政党的存续时间主要是1950年至现在,其社会背景是政党与国家的结合,政党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小,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模糊,强调党员的个人化而非有组织的整体,政党资源主要来自国家补贴,政党运作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的特点,政党之所以参与政治竞争是因为其将政治作为一种职业。商业公司型政党的存续时间主要是1990年至今,其产生背景是商业集团的政治化,政党组织高度依赖其领袖,主要雇佣选举技术专家来进行媒体动员和市场营销动员,政党运作的特点是资本密集型加技术密集型,政党参与政治竞争的目的是通过政治保证其经济利益的获得。<sup>[22]</sup>当然,库维尔的界定主要基于欧洲政党发展的现实。

按照西方的政党分类标准,泰国的绝大多数小党都属于精英型政党。美国学者戴维·维尔森(David Wilson)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泰国政党有过如下描述:泰国政党在它们存在的时候“并无或者极少在议会之外有什么组织。一般来说,议员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自己所属的省份赢得选举,政党标签是无足轻重的。政党从来没有代表过真正的社会势力,只不过代表着最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集团和个人罢了”。<sup>[23]</sup>维尔森的描述在今天的泰国政党政治中仍然有效。泰国的大多数政党历史都比较短,缺乏组织建设和延续性,往往以某一政治领袖为中心,而且转换政党的现象非常频繁。这些政党几乎是完全为争夺和分割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庇护关系网络。这些都是精英型政党的基本特征。

只有民主党和泰爱泰党属于例外情况。民主党已经具备一些群众型政党的特征:进行政党的正式组织建设,积极发展基层组织,到1997年时已发展基层组织172个;整合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纲领,上世纪60年代时该党的基本纲领是林肯的民主思想,即民有、民治和民享,到70年代时逐渐调整为民主社会主义;<sup>[24]</sup>巩固稳定的选民基础,该党的主要基础在经济发展较发达的泰国南方,主要选民群体是工商业者和城市中产阶级。泰爱泰党是1998年之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政党。泰爱泰党的情况比较复杂,下一部分将作详细分析。

#### 四、泰爱泰党的学习困境与后发劣势

泰爱泰党最初是以试图进入政治领域的商业精英联盟的形式出现的。这一商业精英联盟是一种松散的、非组织化的联盟，属于典型的精英型政党模式。但之后，泰爱泰党很快就进入转型阶段。按照西方政党发展的规律，泰爱泰党最先应该学习群众型政党的特征，应致力于发展党员并进行组织建设。在实践中，泰爱泰党确实也注重党员和组织的发展。到2001年选举时，其党员数量据称已经达到800万，到2005年时，党员数量增加到1400万。泰爱泰党还组织每年的全国党员大会和不定期的地区党员会议。<sup>[25]</sup>然而，这些党员数量和党员大会仅是象征意义的。这些党员并不需要向泰爱泰党缴纳党费，也几乎不参与任何政党组织的活动。党员会议更多是欢迎政党领袖的一个仪式，而不是产生政党代表和政党领袖的一种机制。党员并没有影响政党的正式渠道。到2005年初，他信允诺将模仿美国政党的初选模式，并将在地方引入由党员选举泰爱泰党候选人的机制。2005年7月，在泰爱泰党的总部新迁之后，他信宣布其打算对泰爱泰党进行全面制度化。但是，直到2006年政变之前，却一直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出台。<sup>[26]</sup>泰爱泰党对群众型政党模式的学习和实践过程并未完成。

实际上，泰爱泰党在其政党转型过程中一直处于一种学习的困境。西方政党的多种模式特征都可以从泰爱泰党的政治行为中表现出来，这表明泰爱泰党在试图学习西方的多种政党模式。譬如，泰爱泰党试图学习西方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希望取悦社会的各个阶层。例如，在2001年大选之前，泰爱泰党与工会组织、穷人协会（泰国最为活跃的公民社会组织之一）以及商会组织等进行私下协商，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但在2001年执政之后，泰爱泰党背弃了诸多其在竞选时的私下允诺。他信允诺工会组织将在执政后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协定和建立一个职业健康和安全研究所，他信允诺穷人协会将在执政后改造严重污染环境的巴蒙大坝，但他信在施政后均无意兑现这些承诺。泰爱泰党在选举承诺中的全方位特征与施政实践中的偏农村倾向之间的距离，引发了除农民阶级之外多数社会阶层与泰爱泰党的反目。<sup>[27]</sup>

再如，泰爱泰党也试图学习对西方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的特征，即吸纳其它政党，或与其它政党结盟，试图实现一党独大地位。然而，泰爱泰党在急速扩张中并没有采取选择性吸纳和渐进整合的战略，结果是政党的版图迅速扩大，然而内部却存在严重的分裂，如存在汪南然集团、自由正义党集团、新希望党集团、曼谷民代集团、国家开发集团和汪磨挽集团等。<sup>[28]</sup>这种党派分裂和整合缺失使得泰爱泰党更像一个政党联盟，而不像一个完全整合和凝聚力较强的政党。更为恶劣的结果是，泰爱泰党的无约束性扩张导致了执政联盟扩大而待分割利益不变之间的紧张，用美国政治学家赖克（William Riker）的表述，就是这种扩张破坏了最小获胜联盟法则（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 law）。赖克认为，政党联盟需要保持一个最小获胜规模，是因为政党联盟规模越大，每个成员获得的利益份额越少，维持联盟的成本也越高。<sup>[29]</sup>这种因利益分割产生的矛盾导致他信原亲信林明达（Sondhi Limthongkul）的倒戈，而林明达的倒戈是引发反他信运动的重要因素。<sup>[30]</sup>

另如，泰爱泰党同样在学习西方商业公司型政党（business-firm party）的运行特征。在所有的政党学习中，这一学习最为深入，这与他信的商业背景有很大关系。商业公司型政党最佳的范本是贝鲁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泰爱泰党在2001年选举和2005年选举中运用许多政治营销的技术，如使用其商业集团中的营销专家和公共关系专家通过广播和平面媒体塑造选民偏好等。但问题是，商业公司型政党的运作模式太过现代，甚至有许多后现代的元素，而泰国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社会还很传统和保守，对商业化的力量有本能的恐惧感。而具有相当独立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则逐渐对他信集团滥用选举技术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对态

度。对商业公司型政党的学习导致了泰爱泰党的民粹主义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最终的毁灭式结果。

泰爱泰党的政党学习反映出一种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是与后发优势结合在一起的。后发优势体现为后发国家凡事都可因循早发国家的模板而为，后发劣势则表现为选择太多，而导致每次学习都不深入，而浅层和扭曲的学习往往隐含着桎梏和危机。早发国家往往逐个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并有序地完成政治制度化。但后发国家，特别是在当下全球化时代下的后发国家，则很难次序地逐一完成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突发性地集聚爆发。后发国家有制度学习的优势，但后发国家很难找到早发国家在应对问题时的单一情境。譬如，早发国家在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的背景下完成了政党制度化的过程。阶级斗争提供给政党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工人运动则提供给政党充足的会员和固定支持者。但目前后发国家面临的情境非常复杂，一方面，后发国家需要完成国家构建和政治制度化，这些因素是决定后发国家政治稳定和秩序发展的关键，另一方面，后发国家面对的政治生态已经出现一些不利于政治制度化的变化，如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和媒体政治的兴起，这两点与群众型政党模式生成的背景已大不相同。而后发国家因为制度学习而面对的制度选择又较多，如泰爱泰党的政党运作模式似乎是希望吸收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卡特尔政党和商业公司型政党四者的优势。但这种跳跃式学习模式和跨越式发展路径使其陷入一种学习的盲乱和发展的困境。这种学习和发展模式可以导致选举绩效的迅速攀升，但也容易导致其政党发展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

#### 结语、政党模式的次序变迁与民主巩固

质言之，民主巩固的核心是制度与文化。在泰国的民主巩固中，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已经使民主文化开始在泰国民众中生根，这一点可以从2006年泰国政变后军人集团对公民民主态度的忌惮上找到例证。虽然泰国的民主文化还很不成熟，如民众仍然保有对庇护政治和金钱政治的习惯性理解，而政治精英也缺乏对政治妥协的理解和认同，但民主文化的构建并非一日之功。而当下泰国民主巩固中最为紧要的是政治秩序的稳定。而强大的政党和有效的政党体制才是政治秩序稳定的关键，这一点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进行过充分阐述。<sup>[31]</sup>

1997年泰国宪法和2001年泰爱泰党的崛起本来给予泰国民主巩固一个绝好的政治机会，然而泰爱泰党的跨越式学习在促使其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埋下之后在喧嚣中退场的隐患。西方政党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党模式的发展不能跨越，特别是群众型政党对于一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更不能被回避。群众型政党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通过发展缴纳党费的党员，并鼓励党员参与政党活动，来实现政党认同的凝聚，使得社会逐步认同政党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逐步习惯通过政党来表达利益诉求。当然，泰爱泰党的解散并非意味着泰国民主巩固的恶性终结，只不过意味着泰国的民主巩固需要更长的时间和实践来完成。未来泰国的民主巩固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公民社会，而政党才是肩负更多民主巩固责任的重要行为体。泰国政党向群众型政党的完整发展是泰国民主巩固的关键。从主要政党的制度化，到整个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再到整个政治系统的制度化，直至民主制度的巩固，这是一个因果关联、环环相扣的政治发展过程。未来，泰国民主巩固的希望可能更多应寄托在民主党和继承了泰爱泰党的人民力量党身上。

注释：

- [1] Dankwart Rustow,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pp. 339-346.
- [2] Seymour Martin Lipset, 1994,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9, p. 7.
- [3] [11]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 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21页、第15页。
- [4] Adam Przeworski, 1992, "The Game of Transition,"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 Donnell and Samuel Valenzuela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 106.
- [5] Guillermo O' Donnell, 1995, "Illusion about Consolidation,"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41-53.
- [6] Robert A. Dahl, 1995,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c Culture,"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34-35.
- [7] [9] [美]胡安·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第7-10页。
- [8] [3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4-344页、第341页。
- [10] [15] [澳]约翰·芬斯顿主编:《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张锡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0-304页、第326页。
- [12] 陈建荣:《泰国民主的前景:君权、法制、金钱与政党》,《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6期。
- [13] 王子昌:《泰爱泰党与泰国的政治发展》,《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1期。
- [14] [24] 任一雄:《政党的素质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从泰国政党的历史与现状看其民主政治的前景》,《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5期。
- [16] 周方治:“泰国政治动荡的原因与前景”,《当代世界》,2008年第10期,第24-25页。
- [17]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uthen, 1954, p. 71.
- [18] Otto Kirchheimer, 1954, "Notes on the Political Science in Western Germany," *World Politics*, Vol. 6, pp. 317-318.
- [19] Richard Katz and Peter Mair, 1995,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Vol. 1(1).
- [20] Jonathan Hopkin and Caterina Paolucci, 1999, "The Business Firm Model of Party Organization: Case from Spain and Ita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35, pp. 307-339.
- [21] [22] André Krouwel, 2006, "Party Models,"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Crotty ed., *Handbook of Party*

[23] David A. Wilson, 1962, *Politics in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68.

[25] [26] [27]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2008, "Thaksin's Popu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8(1).

[28] 李路曲: 《泰爱泰党一党独大局面的形成》, 《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

[29] William H. Riker,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32-33.

[30] Oliver Pye and Wolfram Schaffar, 2008, "The 2006 Anti-Thaksin Movement in Thailand: An Analys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8(1).

## Change of Party Model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hailand

Gao Qiq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In defining the content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western scholars have mainly three paths,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path, democratic cultural path and pluralistic integrative path. Among them, theorist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party especially stress the role of parties. Thailand's constitution in 1997 and the rise of TRT created some prerequisites f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fter the secon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ailand. However, TRT didn't concentrate on the building of mass party, but in skipping way learn the experi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tch-all, cartel and business-firm parties. This learning model makes TRT rise up quickly, and also make TRT go down loudly later. TRT's practice shows a learning dilemma of l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rov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dual change of party model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Keywords:** party model;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ty change; civil society; Thailand